

# 漢代羌人的社會政治組織與族群認同

朱聖明

廈門大學歷史系

## 摘要

兩漢時期，由於外在環境的差異，影響各羌落分散與聚合的因素各不相同，加上涵蓋所有羌人的決策機構尚未形成，大多數羌落在與漢朝的互動中均能自主地進行政治抉擇。受其影響，在漢代羌人中曾先後產生與同時存在過「部落」、「部落聯盟」、「國家政權」三種不同層次的社會政治組織。與之對應，羌人的族群認同亦呈現出層次性和多樣性。整體而言，漢代羌人無論是在政治組織、社會結構還是族群認同上都與商周「羌人」極為類似。對漢代羌人生存狀態的考察，或許可為我們探討商周「羌人」群體的彼此差異及族屬問題，更好地理解商周秦漢「華夏」西緣複雜的人群生態和政治格局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思路或解釋模式。

**關鍵詞：**羌人、羌落、羌聯盟、羌政權、族群認同

---

朱聖明，廈門大學歷史系，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南路422號，郵政編號：361005，電郵：[zhushengming1984@163.com](mailto:zhushengming1984@163.com)。

本文的研究工作得到福建省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漢代『邊民』的族群身份與國家認同研究」（項目編號：2013C042）和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差異性視角下的秦漢『邊民』研究」（項目編號：14CZS026）資助。匿名評審人提出了寶貴建議，本文在修改過程中已盡可能採納，特此致謝。

## 一、前言

近百年來，學界在羌人歷史的研究上湧現出了大量的學術成果，牽涉到不同歷史時期羌人的來源與流變、分佈與遷徙、社會文化生活、與他族的關係等各個方面。<sup>①</sup>其中，新近影響最大的無疑當屬王明珂以歷史人類學方法對羌人展開的系列研究。自1997年以來的十餘年間，王明珂先後在島內與大陸出版了《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蠻子、漢人與羌族》、《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等多部有關羌人研究的論著。在這些著作中，王先生認為歷史上並不存在一個「羌族」，「羌」只是華夏對西方異族的泛稱；在特定的地理環境與遊牧經濟作用下，被泛稱為「羌」的人群，只是眾多大小不等的分散性部落，他們彼此之間相互攻殺劫掠，並未形成強烈的族群自我認同。作為其所謂「民族史的邊緣研究」方法的具體例證，王明珂對羌人的研究遵循或踐行着其一貫的「邊緣」研究模式與風格。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浸染了該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在上述著作中，他一再強調羌人居地的地理環境及分散化遊牧經濟對羌人族群認同的決定性作用，並輔之以現代羌人的田野調查材料，以此來論證說明位於華夏邊緣的羌人在自身族群認同上的主導性與分散性。如羅豐等先生指出的，這一研究理路忽視了「邊緣」與「中心」的政治文化互動及這些互動給邊緣族群之認同帶來的重要影響。<sup>②</sup>具體到兩漢時期，王先生在羌人的凝聚及族群認同上較少關注漢羌互動的因素及其作用。

與之相反，常倩則認為漢代羌人逐漸形成了極強的凝聚力，且在東漢時產生了強烈的族群認同。其將促使羌人凝聚的因素歸納為三點：一是羌人內部的種姓家支制度，二是漢代統治階級的治羌政策，三是華夏對羌人的歧視。<sup>③</sup>這種論斷同時考慮了羌落內外可引致團結、促成認同的因素，具有一

① 參閱耿靜，〈羌族研究綜述〉，《貴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頁173-176；常倩，〈近百年來羌族史研究綜述〉，《貴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頁112-116；李健勝、武剛等，《早期羌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1-20。

② 羅豐，〈什麼是華夏的邊緣——讀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1期，頁171；張雲，〈民族歷史學研究的一股清風——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讀後〉，周偉洲編，《西北民族論叢·第6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348-357。

③ 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貴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頁74-80。

定的說服力。然而，為了論證羌人的凝聚，它又過於忽略了羌落之間一直存在的彼此分枝獨立、相互攻伐的事實。誠然，眾多事例表明，東漢中後期在某些羌落間的確產生了顯著的族群認同。但是，這些羌落並不能代表羌人之全部。漢代各羌落因所處地域不同，與漢人、中原政權的接觸程度存在較大差異。在此種情況下，各部羌人所體現出來的族群自我認同的程度及特點當然也就不盡相同。

自戰國初年以來，出現在中原史籍記載中的羌人均分佈於華夏（諸夏）西部邊緣的高原河谷地帶。在特定的地理環境及生計模式作用下，這些羌人集結成許多個獨立分散的部落，彼此抄掠、相互攻殺。隨着中原政權的向西擴張與開發，以及內徙羌人於邊郡，某些羌落與中原的互動漸趨深入，突破單一羌落的族群凝聚力逐步形成。在此基礎上，部份羌落開始以結成部落聯盟乃至建構國家政權來抵禦外界壓力。及至漢代，羌人中間便出現了部落、部落聯盟、國家政權三種不同的社會政治組織。這三種組織不光是伴隨漢羌互動的深入而相繼出現，在一定歷史階段內它們還是一種並存的關係。即並不是所有的羌落都結成聯盟，亦非所有羌人均被納入到羌人政權的管轄之下。同樣是諸多羌種的聯合組織，羌聯盟與羌政權集結下的羌人種落及其所處地域也各不相同。因此，單純以分化的羌落、聚合的羌聯盟或一定集權化的羌政權，來論證羌人族群認同的程度及特點，都未免有以偏概全、管中窺豹之嫌。

有鑑於此，本文將基於眾多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進一步考察漢代諸羌的分佈及其地緣環境，分析各種導致羌人分散與聚合的因素，從而弄清三種羌人社會政治組織得以產生並存在的內外條件。在此基礎上，逐一解析不同社會政治組織下羌人的族群認同意識。同時，本文還將兼顧考察商周「羌人」的生存狀態，以期明曉其與漢代羌人在社會政治組織的產生及族群認同上的某種類同關係。筆者認為這種長時段、整體視野下的審視與剖析不僅能使我們更好地了解漢代羌人族群認同的具體程度及其特點，亦有助於推進對商周「羌人」的研究。

## 二、何謂「羌」？「羌」之抉擇？

自商代起，羌人便與中原政權及人群開始了密切的交流。殷墟甲骨文中出現了大量關於羌、羌方、北羌、馬羌等的記錄，這些羌人或曾與商人彼此敵對、戰爭相向，或曾臣屬服事於商朝；在先周時期，羌人中文明程度較高

的姜羌與周人世代通婚。武王伐紂，羌為與周聯盟的西土八族之一；兩周時期，羌人中除與周王室關係密切的一些姜姓諸族得以分封建國外，其他羌人則被涵括在更為廣泛的「戎」之稱謂中，很少以「羌」稱在史籍中出現。戎人中很大部份是羌人，此已成為前賢之共識。<sup>④</sup> 這些羌戎與西周王朝及東周時期的晉、秦等國發生關係最多，其中既有和平共處，亦有激烈戰爭。<sup>⑤</sup> 西漢武帝時，漢朝為隔絕羌胡交通，「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sup>⑥</sup> 因受逼於漢，「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sup>⑦</sup> 宣元時期，漢人勢力又逐步滲入河湟地區，並與當地羌人發生劇烈衝突。東漢以降，羌人叛亂日漸頻繁，與漢朝之間戰爭不斷，成為嚴重威脅漢祚存續的「羌禍」。

從以上作為典範的早期羌史可知，在商代到東漢這一漫長的時期內，羌或羌人始終在中原政權西部族緣關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這些與中原發生關聯的羌或羌人卻均分佈在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歷史源流與社會政治形態。

關於商代羌人。陳夢家認為所有與羌有關的方國都在山西南部與河南；<sup>⑧</sup> 李學勤通過對商王田獵區域的分析，認為羌方在山西南部或更西地方；<sup>⑨</sup> 黃烈考證認為卜辭所見「羌方」活動地域主要在晉西南，以及黃河西岸陝西境內的一部份和黃河南岸河南境內的一部份。他認為「羌方無疑是羌族中最大的軍事部落集團」，而北羌、馬羌則是指「羌方以外的羌族集團」；<sup>⑩</sup> 張天恩則主張直到殷墟文化第二期，商文化還覆蓋着晉南和關中的大部份地區，因此殷墟一、二期卜辭中的羌族文化不會處於這兩個地區。其主張卜辭所記「羌」及「羌方」所對應的考古學文化為分佈於今關中西部和

④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63。冉光榮等認為姜氏之戎（包括伊洛之戎、陸渾之戎等）、允姓之戎、義渠都屬羌人系統；臺灣劉文起亦認為羌族為西戎一支，羌戎、陸渾戎、義渠戎等，名雖為戎，而實皆為羌。分別參見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羌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頁36-44；劉文起，《王符〈潛夫論〉所反映之東漢情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頁251。

⑤ 參閱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63-76。

⑥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64，頁3006。

⑦ 范曄，《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87，〈西羌傳〉，頁2877。

⑧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頁281。

⑨ 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頁77-80。

⑩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52、49。

甘肅東部地區的劉家文化，卜辭所載商王朝與羌方的大量戰爭主要發生在商文化與劉家文化之間。<sup>⑪</sup>

關於先周時期的羌人。黃烈認為與周人通婚的姜羌處在周原東側，其文明程度要高於羌方，「姜羌可能是與羌方同族的另一支」。<sup>⑫</sup> 黃先生將劉家文化定性為姜戎文化，認為其與「姜嫄之國」存在莫大關聯，其所屬人群已經開始了定居生活。<sup>⑬</sup> 另外，他還指出與周聯盟伐紂的「羌」實為「（商代）羌方之羌，而非隴右塞外的西羌」。<sup>⑭</sup> 李健勝亦持此觀點。<sup>⑮</sup>

關於兩周時期的羌戎。據傳世文獻及西周金文的記載，穆王特別是厲王之後，宗周與其西、北方的諸戎一直持續着頻繁而激烈的衝突。平王東遷後，「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sup>⑯</sup> 這其中便有被認作是羌人的伊洛之戎、陸渾之戎、允姓之戎、姜戎等。他們或趁西周滅亡自行東進，或為秦、晉所招徠遷徙，主要活動在今山西和河南西部一帶。關中地區則依然是諸戎雜處，其中尤以義渠戎最為強大。秦滅義渠後，以其地置隴西、北地、上郡三郡，由此可知義渠戎勢力之盛及其在周秦之際的主要活動地域。據〈史記·秦本紀〉：「（秦厲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則義渠有王；「（秦惠王更元十年）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則義渠城池眾多。此外，義渠王還重用來自「華夏」（晉國）的賢臣由餘，讓其出訪秦國。戰國著名謀士陳軫曾言：「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sup>⑰</sup> 凡此種種，足見義渠是一個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黃烈認為義渠為「有政權之國，非泛稱部落之類」。他指出義渠建國甚早，很可能是商代羌人和羌方的後裔中未被融合的一部份重新集結，建立了政權。<sup>⑱</sup>

關於漢代羌人。根據傳世及出土文獻的記載，與漢帝國發生關係的羌人

<sup>⑪</sup> 張天恩，〈殷墟卜辭所記「羌方」的考古學文化觀察〉，收入氏著，《周秦文化研究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66-68。

<sup>⑫</sup>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57。

<sup>⑬</sup>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59-60。同時，黃先生又指出劉家文化可能與卜辭所見羌方和羌更為接近，而劉家文化的範圍與其考證的羌方活動地域存在一定偏差。

<sup>⑭</sup>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62。

<sup>⑮</sup> 李健勝、武剛等，《早期羌史研究》，頁88-89。

<sup>⑯</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72。

<sup>⑰</sup> 司馬遷，《史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70，〈張儀列傳〉，頁2303。

<sup>⑱</sup>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74、77。

有河湟羌，天山南路之羌（婼羌、赤水羌），河西之羌，<sup>⑯</sup> 蜀、廣漢徼外之羌，東羌等。按〈後漢書·西羌傳〉的說法，蜀、廣漢徼外羌和河湟羌同為無弋爰劍之後。<sup>⑰</sup> 此二者與西域南道之羌、河西之羌因處秦漢帝國西陲，均被泛稱為西羌。東漢時，羌人中又出現了東羌的稱謂。胡三省曾對漢代東、西羌下過定義，其謂：「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sup>⑱</sup> 現代學者對此區分有着不同看法。黃烈認為：「西羌仍指原來意義上的西羌，而東羌則係指被內徙的羌人。」<sup>⑲</sup> 其以地域為限，將所有進入塞內留居的羌人均視為東羌。馬長壽更試圖在源流上將二者區分開來，他認為東羌的來源有兩部份：一是西漢時隨匈奴而來的羌胡之羌；二是從金城、隴西遷來的西羌。<sup>⑳</sup> 近年來，陳琳國又在各家基礎上對羌分東、西進行了精細考證。他認為胡注關於東、西羌的界定是正確的，「東羌是東漢時分佈在朔方、上郡、北地、雲中、五原、西河地區的羌人，他們早在先秦時期就移居於此；西羌是分佈在隴西、漢陽西及金城地區的羌人。後來進入東羌聚居地的西羌融入了東羌，而內遷入關中者，則仍為西羌」。<sup>㉑</sup> 陳先生的論證極為精當，其說可信。

除文獻所記載的羌人外，還有考古學上被視為可能與羌人有關的甘青地區的文化遺存。俞偉超在對卡約、寺窪、安國等考古學文化進行綜合考察的基礎上認為「它們相互之間的關聯和各自具備的特有的表徵，說明它們都是羌人文化，但已經形成為幾個明顯的分支」。他還指出三種文化各自發展的

<sup>⑯</sup> 漢代河西羌人的活動多通過西北簡牘材料展現出來，可參閱張德芳，〈懸泉漢簡羌族資料輯考〉，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上冊，頁364-365；高榮，〈敦煌懸泉漢簡所見河西的羌人〉，《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10期，頁100-106；李健勝、武剛等，《早期羌史研究》，頁132-141。

<sup>⑰</sup> 居延漢簡所示，河西羌人中有「卬羌」。馬智全認為其與爰劍之孫卬有關。何光岳主張卬羌的遷徙路線是先至賜支，後復西行祁連山，進入河西。分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下冊，頁233；馬智全，〈從出土漢簡看漢代羌族部族〉，《絲綢之路》，2011年，第6期，頁7；何光岳，《氐羌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頁220。

<sup>㉑</sup> 司馬光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52，胡三省注文，頁1689。

<sup>㉒</sup>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87。

<sup>㉓</sup> 馬長壽，《氐與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106。

<sup>㉔</sup> 陳琳國，〈東羌與西羌辨析〉，《史學月刊》，2008年，第4期，頁37。陳先生認為東羌的淵源可上推到春秋戰國時代。近來，李健勝等提出新說，主張商代的羌方亦可被稱作「東羌」。參見李健勝、武剛等，《早期羌史研究》，頁113。

程度並不一致，卡約和寺窪應當是羌人不同種姓的遺存，而安國式遺存則屬於羌人中文明程度較高的姜姓部落。<sup>25</sup> 田旭東對寺窪、安國等文化遺存所屬人群及彼此關係的主張大體與俞先生相同。<sup>26</sup> 但這些遺存因遠離商文化的分佈區，與商王朝發生衝突、矛盾的可能性很小，不太可能是卜辭所說的羌和羌方。<sup>27</sup>

另外，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羌人當中流傳着各自不同的祖先傳說。中原文獻對各地羌人來源及與「華夏」關係的描述也不盡一致。如不同史籍分別將羌族及諸姜與炎帝、共工、伯夷、禹、四嶽、三苗、無弋爰劍等人物相聯繫起來。<sup>28</sup> 對於這些關聯，民族史學者反應不一，或支持或懷疑，<sup>29</sup> 亦有持折中說者。如針對〈山海經·海內經〉中氐羌為伯夷之後與《左傳》、《國語》中姜姓羌戎出自四嶽的矛盾，李紹明就指出氐羌出自伯夷父是氐羌系統諸族的共同傳說，而四嶽之後則是氐羌中一支姜姓諸種的傳說。<sup>30</sup>

根據上述分析，商代以來，「羌人」在山西、河南及其以西的廣大地域均有出現。不同歷史時期與中原政權相接觸的「羌人」分處在不同區域，在社會政治形態及文明程度上也存在較大差異。對於如何理解「羌人」的廣佈與彼此之間的差異性，學界存在兩種不同解釋。一是認為「羌」為族稱，其

<sup>25</sup> 俞偉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的探討〉，收入氏著，《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185。

<sup>26</sup> 田旭東，〈從寺窪文化看古羌族文化與周文化之關係〉，《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頁85-88。

<sup>27</sup> 張天恩，〈殷墟卜辭所記「羌方」的考古學文化觀察〉，頁68。

<sup>28</sup>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周語下〉，頁94-97：「（共工）欲壅防百川……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共之從孫四嶽佐之……皇天嘉之……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晉語四〉，頁337：「炎帝以姜水成，……炎帝為姜。」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莊公二十二年〉，頁224：「姜，大嶽之後也」，楊伯峻注：「大嶽即四嶽」；〈哀公九年〉，頁1653：「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徐宗元輯，《帝王世紀輯存》（北京：中華書局，1964），頁49：「（禹）長於西羌，西夷人也。」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卷13，〈海內經〉，頁525：「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司馬遷，《史記》，卷15，〈六國年表〉，頁686：「故禹興於西羌。」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69、2875：「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

<sup>29</sup> 參閱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40-47。

<sup>30</sup> 李紹明，〈論氐和羌、戎的關係〉，《西南民族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頁25-26。

分多種，諸種雖相異明顯，卻仍屬同族。這種說法在很長時間內佔據主流，很多有關羌族研究的論著均做如此處理。<sup>⑩</sup>前述黃烈、李紹明、陳琳國、俞偉超等還試圖在歷史淵源（商代羌方與西土羌族、義渠國）、族源傳說（氐羌系統與姜姓諸種）、地域相近（先秦羌人與東漢東羌）、文化特徵（卡約、寺窪、安國等文化所屬人群）上證明某些「羌人」之間的彼此關聯。一些學者則對不同歷史時期、地域下各種「羌人」間的關係持較為謹慎的態度，僅強調其所指人群的不同。如韓國學者姜允玉即主張商代甲骨文中的羌字是特定民族之族名，春秋中期之後經籍中亦有將羌字用作族名者。與此同時，她又指出殷周羌族、周代姜姓諸族、考古「姜炎文化」、漢代河湟羌族等群體隨着時代改變有着不同的內涵。<sup>⑪</sup>李健勝等認為商周秦漢的羌人部族存在東西分野情況，其分佈區域及文化發展程度不一。<sup>⑫</sup>

另外一種解釋則視「羌」為泛稱，其包含多個民族。傅斯年很早便指出：「羌決不是一個單純的名詞，必含若干不同的民族，只以地望銜接的關係，被漢人一齊呼做羌罷了。」<sup>⑬</sup>黃烈早時也認為：「羌是就社會生產的特徵而言，有着畜牧者的廣泛意義。……如多馬羌、北羌、羌方等，很難說這些部落間都有血緣關係或者族屬關係；至於後來河湟地區的羌人與早期的中原羌人更難說有多少共同之點。」<sup>⑭</sup>羅琨認為：「商代用為人性的羌的涵義並非僅限於羌方的臣民，而是對西北遊牧民族的統稱。」<sup>⑮</sup>王俊傑也指出：「商周的羌是對諸遊牧部落的泛稱，不是一個族名……秦漢的羌是漢代對河湟地區土著遊牧部落的泛稱。他們與商周的羌雖然同稱為『羌』，但二者之間沒有淵源關係。」<sup>⑯</sup>何光岳則認為存在一種廣義的羌人，包括戎、氐、羌

<sup>⑩</sup> 此類論著甚多，茲不枚舉。羌為中國最古老民族之一的觀點目前依然在社會上及學術界廣為流行。現行羌族通史性著作對該族歷史的書寫也多從古史傳說時代延續到近現代。如前揭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等著《羌族史》及新近出版的耿少將所著《羌族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均如是。

<sup>⑪</sup> 姜允玉，〈羌、姜同源說辨正〉，《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頁43-48。

<sup>⑫</sup> 李健勝、武剛等，〈早期羌史研究〉，頁59-61、112-113。

<sup>⑬</sup> 傅斯年，〈姜原〉，收入氏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68-69。

<sup>⑭</sup> 黃烈，〈有關氐族來源和形成的一些問題〉，《歷史研究》，1965年，第2期，頁105。

<sup>⑮</sup> 羅琨，〈商代人祭及相關問題〉，胡厚宣主編，《甲骨探史錄》（北京：三聯書店，1982），頁145。

<sup>⑯</sup> 王俊傑，〈論商周的羌與秦漢魏晉南北朝的羌〉，《西北師大學報》，1982年，第3期，頁92。

三大部份。<sup>⑧</sup>而將此說發揮到極致的無疑當屬王明珂。他明確指出「羌」並不是世代居住在中國西疆的某一「民族」，而只是代代存在於華夏心中一種對西方異族的「概念」。在此基礎上，他還考察分析了從商代到漢代，隨着華夏向西擴張，羌人概念及所指地理人群向西漂移的過程。<sup>⑨</sup>其指出：「並沒有這樣一個『羌民族』在歷史中延續。『羌』只是中國人的一種異族想像。」<sup>⑩</sup>

總體而言，在現有條件下，想徹底弄清商周不同地域「羌人」的具體內涵和彼此之間的淵源關係是極為困難的，這也非筆者能力所及。事實上，學界對羌人早期歷史的研究亦多有推論、猜測的成分。筆者在此所以詳述前輩學者對商周「羌人」分佈及社會政治形態的研究是為了論證說明以下兩點：一是不同時期的「羌人」在與中原的互動中形成了不同的社會結構，分散部落（諸戎）、部落集團（羌方、北羌等）、國家（義渠戎）均有之。〈後漢書·西羌傳〉也注意到了政治互動對戎人（「羌人」）社會政治結構的影響，其言：「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為酋豪云。」<sup>⑪</sup>二是同一時期的「羌人」群體因所處外在政治、文化環境的差異可以有着不同的社會政治形態和文明發展程度。如商周之際的羌方、姜戎以及卡約、寺窪、安國等考古文化遺存所屬人群。又如周代的姜姓諸侯國與姜戎部落。顧頡剛曾言：「申呂齊許者，戎之進於中國者也；姜戎者，停滯於戎之原始狀態者也」，<sup>⑫</sup>這也是同時代「羌人」處於不同文明形態的顯例。

筆者認為此兩點對於我們理解漢代羌人不同社會政治組織的產生及其影響下的族群認同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意義。拋開前述一些學者對不同時期同一地域或同一時期不同地域「羌人」淵源的探討不論，即便這些「羌人」彼此之間不存在任何族屬關係，他們在生計方式上的相似之處卻是無法抹殺的。以往倡導「羌」為泛稱的各學者也多只是否定不同地域或歷史時期的

<sup>⑧</sup> 何光岳，《氐羌源流史》，前言頁1。

<sup>⑨</sup>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146-162。

<sup>⑩</sup> 王明珂，〈蠻子、漢人與羌族〉（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124。

<sup>⑪</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75。

<sup>⑫</sup> 顧頡剛，〈九州之戎與戎禹〉，呂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7冊下，頁125。

「羌人」在血緣、族屬上的淵源關係，而並未認為這些「羌人」在社會生計模式上有何二致。他們都視各時期「羌人」為畜牧或遊牧人群。唯王明珂對此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在〈後漢書·西羌傳〉中范曄是有意將戎與漢代西羌的歷史相互關聯，而事實上戎人在文化、社會結構、經濟生態等方面都與漢代河湟羌族有相當大的差異。其指出：

河湟羌族直到西漢前期還與中國無甚關聯，而諸戎則相當受華夏文化的影響。河湟羌族是遊牧人群；戎相當依賴蓄養動物，但春秋時的戎人並非遊牧人群。河湟羌族為了適應遊牧生活，早已發展出由大小豪酋統治的分裂性社會結構；各個戎的群體，則統於單一的領袖。〈後漢書·西羌傳〉的作者似乎也注意到，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的領袖也自稱「子」，以及戰國時大荔、義渠戎的領袖也自稱「王」，這與西羌有相當的差異，因此他以「（戎）餘眾皆反舊為酋豪」來做解釋。事實上，分裂性結構是許多遊牧社會的特色，這與當地的經濟生態與人群親屬關係都有密切的關聯，並不是輕易可以變來變去的。<sup>③</sup>

王先生的這一對比似乎並不穩妥。首先，華夏文化對諸戎的顯著影響只限於所有被泛稱為「戎人」的群體中的一部份，那些與諸夏之國接觸較少或全無交集的戎人所受華夏文化的沐澤是微乎其微的。而兩周時期與「中國」關聯甚少的河湟羌族也正是被概稱在「西戎」之內的。

其次，對於羌人能否被定位成嚴格意義上的遊牧人群，學界尚存爭議。王明珂明確指出以高原、高山河谷遊牧為主的西羌是漢代北方遊牧社會的一種類型。<sup>④</sup> 在考察西羌的經濟生態時，他雖然注意到了漢代河湟羌人在定期的季節移牧之外也從事農業生產，並認為可用於耕種的河谷地在羌人生計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其終究只是將農作視為羌人的一種輔助性生計活動。然在鍾焓看來，西羌這種同時需要到山地牧放牲畜和在河谷經營農業的經濟形態近似於「高山—低地」輪換式放牧業，是一種利用環境資源的混合經濟方

<sup>③</sup>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150。

<sup>④</sup>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前言頁11。

式，不應被劃歸遊牧的範疇。<sup>⑯</sup> 從河湟羌人與漢朝對適宜農耕的肥美河谷（如大小榆谷等）的殊死爭奪、羌人大量農田的存在及漢軍動輒從羌落擄獲麥谷數萬斛乃至數十萬斛等事實可知，<sup>⑰</sup> 農作在羌人生計中的地位不該只是輔助性的。因而，鍾先生對西羌經濟形態的判定似乎更為合理。另一方面，有關「戎狄非胡」的觀點越來越為眾多學者所接受。<sup>⑱</sup> 這種觀點認為戰國以前「戎狄」所處地域是遊牧經濟與農業經濟的「過渡區」，其生計方式是一種農牧兼營的混合經濟。只是後來伴隨諸夏的壓迫，戎狄所在區域才漸入遊牧化的進程，發展出真正的草原遊牧經濟。因此，從生計結構上看，「羌」與「戎」亦有着較大的相似性。

再次，戎統於單一領袖並稱「王」、稱「子」是在與諸夏之國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其初始狀態並非如此。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諸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sup>⑲</sup> 此又與河湟羌人種類繁多，各散居河谷的生存狀態極為相似；最後，分裂性社會結構的產生、維繫與各部落相對獨立的地域環境是密不可分的。當外部政

<sup>⑯</sup> 鍾焰，〈歷史學研究的人類學化及其存在的問題——評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達力紮布主編，《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3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頁243-244。

<sup>⑰</sup> 趙充國上疏宣帝陳述屯田規劃時說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參見班固，〈後漢書·西羌傳〉提到：「（貫）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見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83；〈後漢書·來歙傳〉則有「歙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范曄，〈後漢書〉，卷15，〈來歙傳〉，頁588）的記載。

<sup>⑱</sup> 相關論述可參閱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224-232；林沄，〈戎狄非胡論〉，收入氏著，《林沄學術文集（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3-6；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87-93；楊建華，〈中國北方東周時期兩種文化遺存辨析——兼論戎狄與胡的關係〉，《考古學報》，2009年，第2期，頁155-183。

<sup>⑲</sup> 司馬遷，〈史記〉，卷110，〈匈奴列傳〉，頁2883。另據前引〈後漢書·西羌傳〉記載，戎本無君長，在與華夏（諸夏）的互動中，戎人出現了類似華夏（諸夏）的君臣階序。在其衰亡後，又重新恢復到舊時酋豪分立的局面。因此，司馬遷與范曄口中的「君長」有着不同含義。〈史記·匈奴列傳〉中的「君長」當理解為部落酋豪；〈後漢書·西羌傳〉中的「君長」則為單一的集權化的「子」、「王」。由此，戎本無君長與范曄所謂西羌「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很是類似。東漢應劭更明言羌與西戎在社會結構上有著同一性：「羌本西戎，……無君臣上下，健者為豪，不能相一。」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488。

治環境發生變化時，其原有社會結構理應有所調整來適應或應對。此時，分散的部落可以為了某種共同利益團聚在一起，結成聯盟或建構國家。如漢代河湟羌各種落「解仇結盟」，先零別種羌豪滇零自稱「天子」、建立政權等行為都是對其內部原有分裂性社會結構的突破。在遭受漢軍打擊後，聯盟分散，政權衰敗，這些羌落又重歸分裂狀態。上述例子均能說明，在外部不同政治環境的作用下，各分散部落的社會結構是可以靈活變動的。

王著《遊牧者的抉擇》將漢代中國北方遊牧社會分為三種類型：一，以草原遊牧為主的匈奴；二，以高原、高山河谷遊牧為主的西羌；三，以丘陵森林草原遊牧為主的鮮卑、烏桓。它們可分別結成「國家」、「部落」、「部落聯盟」三種不同的社會政治組織。王氏認為這些社會政治組織都是遊牧經濟的一部份，它們是為配合各種特定遊牧經濟而產生的。<sup>④9</sup> 由此，他試圖給中國北方遊牧部族的歷史發展尋求一種貫穿古今的解釋模式：因生計模式的相似，人們在社會政治組織發展、與中原（農業地域）的互動上有著大致相同的運行軌跡。如其指出後世地處中國西北及西部青藏高原東緣、遵循高原河谷模式發展的民族與西羌一樣多處於分裂性結構之「部落」中。<sup>⑤0</sup> 對於王明珂先生的解釋模式，鍾煥有着較為詳細的評介與批判。他主張王氏這一宏大敘事的解釋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取決於基本史實的審查檢驗。具體到漢代西羌分佈地區，他指出歷史上的蘇毗、附國、青唐羌、吐谷渾等政權的組織形式都高於「部落」一級，這些都是王氏所謂高原河谷模式不可回避的反例。<sup>⑤1</sup> 鍾先生所舉諸例均在魏晉之後，事實上，早在秦漢之前就有相關異例存在。前述可知，拋開具體族屬不論，商周時期某些經濟生活方式類似的「羌人」群體卻有著不同的社會結構，在政治文明形態上亦存明顯差異。這些足以證明，為適應分散化經濟生態而形成的「分裂性社會結構（部落）」是可以被打破的。而此類異例的形成無不與群體所處外在環境及其與中原政權的互動程度密切相關。

作為對不同遊牧社會歷史發展模式（王氏稱為「歷史本相」）的補充，王明珂也指出了模式的可修正性和可變性，其將之歸因為歷史本相下「人」的抉擇。「歷史中『人』的行動抉擇，也就是『人』突破環境、經濟生態、

<sup>④9</sup>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前言頁11-12。

<sup>⑤0</sup>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前言頁13。

<sup>⑤1</sup> 鍾煥，〈歷史學研究的人類學化及其存在的問題——評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頁259-263。

社會組織等種種『結構』邊界的意圖與作為，能逐漸改變歷史本相。」<sup>52</sup>他認為，西羌以「部落」來維持與爭奪各個河谷的資源邊界，然遊牧人群的「移動力」又常造成西羌部落的解體，其內部每個社會群體（牧團、小部落）都能為其命運自作抉擇，諸如與漢帝國是戰是和、何時分裂為更小群體各自遷徙求生、何時與其他部落結盟或者脫離聯盟，等等。在王明珂看來，遊牧經濟中的要素「移動」配合着「抉擇」，兩者可以造成遊牧群體突破原有邊界（社會群體組織、制度）。但同時，他又指出並非所有的人或人群都有同等的抉擇以跨越邊界的能力，在歷史長河中，人們更為普遍的是安然處於種種社會邊界內。<sup>53</sup>

不得不說，王先生對不同遊牧社會歷史演進軌跡高屋建瓴的論述模式的確讓人深受啟發，耳目為之一新。然此種歷史人類學視角下的宏大敘事也經常容易「遮蔽」或「忽略」某些有待深度挖掘的事件、現象與進程。在王氏論述模式下，眾多歷史事件或現象被人為地安排在「表相」的位置以服務於他的定位與調遣，來論證其所謂沿相似軌跡一再重演的歷史本相。<sup>54</sup>其他具有特殊性、異質性的事件則被略視。而這些事件對於打破王氏近似歷史循環論的言說顯然具有關鍵意義。

具體到「羌人」（包括漢代羌人），筆者認為其說尚有補充、完善之必要。第一，在外在族群與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羌人」原有的適應特定經濟生態而生成的社會組織是可以被突破的，前已述及。第二，「羌人」跨越「結構」邊界（「部落」）的抉擇不全都是一種為爭奪生計資源或求取生存的「內在」短時抉擇，有時也是一種順應外部環境的「外在」長久抉擇。在相對隔絕的環境下，或是在應對外在族際與社會環境臨時且斷續的壓迫時，「羌人」對分裂或聯盟的抉擇都是短暫、不穩定的。一旦生計資源得到滿足或外在危機被解除後，其部落組織便又恢復到常態；而當外在壓迫變的強大而持久，或生存環境發生質的變化時，「羌人」對社會政治組織的抉擇則是長久而穩固的。從以上對商周「羌人」群體的分析可知，那些地域上鄰近中原且與中原族群互動頻繁的「羌人」，對社會政治組織的抉擇均能超越「部落」形態。另外一些「羌人」（如姜姓諸國、中原諸戎）因各種原因遠離

<sup>52</sup>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頁243。

<sup>53</sup>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頁192-194、249-251。

<sup>54</sup> 鍾煥，〈歷史學研究的人類學化及其存在的問題——評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頁260。

「故土」，生存環境發生變化，其社會結構也隨之變易，出現了單一化的領袖。這些由外在環境引致的抉擇所造就的「羌人」社會政治組織都是較為持久和牢固的。如羌方在五期卜辭中均有出現，與商人戰和交錯，互動頻繁。<sup>55</sup> 義渠與秦相爭，前後持國數百年之久。正因如此，外在環境的各異使得「羌人」群體走上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當然，對於那些只是與外部「華夏」族群密切互動但並未離開原有生存地域的「羌人」群體而言，當其所構建的社會政治組織（部落聯盟或國家政權）被外力摧毀後，由於基本生計方式並未有太大改變，「羌人」可能重歸原有的「部落」形態。如大荔、義渠國衰敗後的餘種戎，滇零政權覆亡後的各種羌等。第三，同處高原河谷的地理環境，各「羌人」部落在應對外在壓迫時的抉擇並非完全一樣，不是所有的抉擇都會跨越原有「結構」邊界。如在秦國的威脅下，爰劍曾孫忍及舞選擇「獨留湟中」，他們的季父卬則是率部遠徙。<sup>56</sup> 再如面對漢朝的壓力，河湟羌人部落至少會存在以下三種抉擇：與其他部落結成聯盟共抗漢軍、繼續在當地忍受壓迫、遷徙他處。其中，後兩者的「結構」邊界便沒有改變。

顯然，基於以上分析，僅以「羌」包含不同民族或種類分支（即族群差異或族群內部差異）來解釋各時期各地域「羌人」所處政治、文明形態的不同似乎過於片面化了。在相似的地理環境和生計模式下，商周西部邊緣人群即便分屬於不同民族，其在社會結構、組織形式等方面的初始狀態也應是基本類似的。事實上，不同地域「羌人」諸多方面的差別多是在後天族際互動中形成的。為適應變化着的外部環境，部份「羌人」群體或多或少地改變或脫離了原有的社會結構，諸「羌」之間的差異便因此而生。

筆者認為前述某些商周「羌人」群體結成部落集團甚至建立國家可視作是其為適應外部社會環境所做的「外在」抉擇。這些抉擇使得「羌人」原有的社會結構（分裂性結構）、群體組織（部落）被突破，建構在此之上的社會人際關係也隨之發生較大變動。在分散化與平等化的部落形態下，人與人之間、人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都是短暫且易變的。由此，個人對所屬牧團或部落的認同都不必是永久的。<sup>57</sup> 而在中央化與階序化的部

<sup>55</sup> 孫亞冰、林歡，《商代地理與方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268。

<sup>56</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76。

<sup>57</sup>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72。

落集團及國家形態下，個人與群體均被要求服從政治權威，持久穩固的族群認同得以形成並存在。商周時期，各「羌人」群體因分處於不同的政治形態，其在族群認同上的程度也就難免參差不齊。反過來亦可說族群認同強度的差別造就了「羌人」不同社會政治組織的生成。

綜上，我們將商周時期與漢代羌人具有類似經濟生活方式，被認為在歷史淵源、地緣、族源、文化等方面與漢代羌人有着或多或少關聯的人群總稱為「羌人」。<sup>⑧</sup>這些處於不同歷史時期與不同地域的「羌人」在與中原政權的互動中，應對不同的外在環境有着各自相異的抉擇。其中，跨越「結構」邊界的抉擇使得某些「羌人」群體形成了新的、更高層次的社會政治組織（部落集團、國家）。由此，商周各「羌人」群體社會政治形態的不同或可歸結為自我抉擇的差異性。

由於初始社會結構、地理環境、生計模式的相似，漢代羌人與商周「羌人」在社會政治組織的產生及抉擇上有著諸多類同之處。因此，對商周「羌人」生存狀態的分析探討有益於我們理解漢代羌人不同社會政治組織的產生及族群認同的特點。

### 三、漢代羌人的分散與聚合

相對於商周「羌人」記載的語焉不詳且相互抵牾，史籍對戰國秦漢羌人的記錄則翔實許多。〈後漢書·西羌傳〉對戰國以來西羌的祖先傳說、遷徙路線、各部關係均有較為明確的記載。這是因為戰國以降，特別是入漢後，中原與西羌的接觸逐漸頻繁，對其之了解也日臻成熟。史書中有關這一時期西羌的各種信息，或徑直來源於羌人，或有中原政權與官民的直接參與，其可信度是相對較高的。

在祖先傳說上。依〈後漢書·西羌傳〉，秦厲公時，秦國奴隸無弋爰劍逃入河湟間，為諸羌敬信，「推以為豪，……其後世世為豪」。<sup>⑨</sup>薛生海考證認為無弋爰劍的傳說源於西羌人的記憶，其史事最早為東漢官修史書《東

<sup>⑧</sup> 須要特別指出的是，筆者並不認為商周「羌人」一定同漢代羌人之間存在直接淵源關係。正因如此，在牽涉商周「羌人」時，我們均寫作加引號的「羌人」，以區別於單指漢代羌人。本文只是將商周「羌人」同漢代羌人看作互為比較研究的對象。通過二者的交互對比，以促進我們對漢代羌人的探討以及反思學界過往對於商周「羌人」的認知。

<sup>⑨</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75。

觀漢記》中〈西羌傳〉所記載，最後經過范曄整理、加工，演繹出爰劍故事。<sup>⑩</sup>即該傳說的基本內容來源於西羌。

在遷徙路線上。西羌的遷徙多與秦漢政權的舉措緊密相關，史書於此記載甚詳。據〈後漢書·西羌傳〉，蜀、廣漢徼外的諸種羌人便是爰劍之孫印因懼怕秦國，率眾南遷，其子孫分枝繁衍而形成；<sup>⑪</sup>留居湟中的西羌（爰劍曾孫忍及其弟舞之後）在西漢武帝時被迫遷離故土，依西海及鹽池附近河谷而居，此部羌人便是日後與漢朝之間戰爭不斷的河湟羌人；景帝以來，河湟羌人開始內遷進入塞內。<sup>⑫</sup>宣帝之後，其內徙者逐漸增多。東漢以降，在各種因素的推拉下，河湟羌人更是大量內徙，<sup>⑬</sup>漢朝西北沿邊諸郡乃至三輔三河之地均見其蹤跡。與此同時，西南徼外諸種羌人也紛紛內附。

在各部關係上。無弋爰劍之後，西羌興起了所謂的種姓家支制度。爰劍子孫分別為西羌諸種豪酋，各領種人。其中，印率種人南徙，「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忍及其弟舞留居湟中，「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sup>⑭</sup>「即每個兒子都可以從大的家支中分離出去，形成獨立的家支，並成為自己家支的酋豪。」<sup>⑮</sup>近些年來，敦煌漢簡、懸泉置漢簡的出土均證實傳世文獻所載不虛，這一分支獨立的制度的確存在於西羌之中。<sup>⑯</sup>

以上可知，漢代西羌各種落雖然散居在華夏西緣廣大的高原河谷間，但其有着共同的祖先記憶、明確的遷徙源流、或近或遠的親緣關係。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促使各羌落得以凝聚的紐帶。因而，此時的「羌」絕不像前述一些學者認為的只是河湟土著遊牧人群的泛稱或僅為華夏人的一種西方異族「想像」或「概念」。否則，我們很難理解在面對共同壓迫時，燒當、燒

<sup>⑩</sup> 薛生海，〈無弋爰劍史事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頁8-10。

<sup>⑪</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75-2876。

<sup>⑫</sup> 據〈後漢書·西羌傳〉，「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76。

<sup>⑬</sup> 王力、王希隆，〈東漢時期羌族內遷探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頁48-55。

<sup>⑭</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76。

<sup>⑮</sup> 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頁75。

<sup>⑯</sup> 相關研究可參閱汪桂海，〈從出土資料談漢代羌族史的兩個問題〉，《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頁2-3；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頁76。

何、煎當、當闡等近親羌種為何較他種更易聚集（見附表）；<sup>⑯</sup> 安帝永初二年（108）滇零稱帝於北地郡時，又何以能召集遠在西南的武都、參狼諸種落。<sup>⑰</sup> 正因西羌各種落有着事實上的血緣或同源關係，在與外界發生衝突時，眾羌便能很容易地集聚在一起而產生族群認同感。在這一過程中，來自漢朝的壓迫所造就的羌人共同利益雖然也起着重要誘導作用，但其終歸只是扮演着一種催化角色，沒有羌落內部本身的血緣等紐帶，很難說這種短暫的利益趨同能在多大程度上促成羌人的凝聚。漢代西羌雖以部落散居，聚合無常，尚未形成穩定的民族共同體，但在某些方面，其已具備了「近似」於民族的特徵。<sup>⑲</sup> 而單純將此時的「羌」視為泛稱、想像或概念均緣於一種客位視角，其容易讓人忽略各羌人種落或同一種落大小豪之間的某些內部關聯或凝聚因素。況且，「即以秦漢而論，在中原人看來，西北不僅只有一個西羌，而且還有匈奴、月氏、烏孫等族」。<sup>⑳</sup> 「（兩漢王朝的漢人）將特定的人群都稱為『羌』，應當是發現這些人群在語言、經濟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等方面是比較接近或基本相同的，並非僅僅只是簡單的將西邊的異族人群統稱為羌。」<sup>㉑</sup>

很明顯，在西羌內部，促使種落分散與聚合的因素同時存在着。一方面，諸羌部落分佈零散，聯繫不便。由於分支獨立制度的存在，各種落彼此

⑯ 在種姓家支制度影響下，羌人酋豪在名字命名上產生了一種「父子聯名制」（或稱「父子連名制」）的制度。根據這種制度及西羌部落常以「父名母姓為種號」的傳統（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69），我們可以大致推斷出兩漢不同羌落之間的血緣親疏關係。那些有着較近血緣關係的羌人種落在面對共同利益時更易凝聚在一起。關於羌落血緣關係在羌人種號和豪酋姓名上的體現，可參閱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頁180-188；高榮，〈敦煌懸泉漢簡所見河西的羌人〉，頁102-104；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頁74-76。

⑰ 據陳琳國研究，先零種羌是在滇零稱天子時進入北地並轉化為東羌的。參閱陳琳國，〈東羌與西羌辨析〉，頁35。在此之前，先零種羌雖入居塞內，但其西羌身份並未改變，其與其他西羌種落的血緣關係更未割斷，如直到永初元年（107）先零羌還與鍾羌一起反抗東漢壓迫。武都、參狼羌（爰劍之孫卬之支系）雖遠離北地郡且此前均與先零羌無甚交集（史籍中未見一起結盟、共抗漢軍），兩者與先零羌也沒有多少共同利益（相隔懸遠），但他們卻能為滇零所招集且附和之。這其中，彼此之間的血緣關係當發揮着重要作用。而滇零此時所以並未招集河湟地區的羌落，應是因為當地燒當羌勢力最甚，而先零羌與其有着很深仇怨（燒當羌曾奪取先零羌世居之地大小榆谷）。

⑲ 王俊傑，〈論商周的羌與秦漢魏晉南北朝的羌〉，頁84-89。

⑳ 李紹明，〈論氐和羌、戎的關係〉，頁21。

㉑ 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頁79。

之間互不統屬，「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sup>72</sup> 為爭奪生存空間和生活資料，各種落相互抄掠、彼此仇殺；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種姓家支制度的作用，各種落之間存在或多或少的血緣關係，當受到外界壓力時，各羌落便能以結盟對抗。

同樣，在西羌外部，外力亦可引致羌落的聚合與分散。如羌人的結盟往往以漢朝的壓迫為誘因。兩漢統治階級對羌人的強迫遷徙、剝削掠奪、殘酷鎮壓及漢人對羌人的歧視等均能促進羌人的凝聚。<sup>73</sup> 與之相異，並非所有的羌落都能團結在反抗中原王朝的旗幟下，部份羌落一開始便會選擇遠徙以避鋒芒。如前述爰劍之孫卬之種落。而有些羌落在受到漢軍重創後也會轉而遷徙避難。如和帝永元十三年（101），燒當種迷唐部在護羌校尉周鮪、金城太守侯霸的打擊下，「其種眾不滿千人，遠逾賜支河首，依發羌居」。<sup>74</sup> 在這裡，來自外部的壓力則使得原本散居的羌落在地域分佈上更加分散化。

此外，伴隨對西羌內部組織形態的了解漸趨深入，面對羌人的結盟，漢朝統治者也有相應政策分化瓦解之。其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採取財物利誘、誅主釋從、軍事震懾等措施分解現有聯盟。如宣帝時期，應對先零與罕、開等羌種的解仇作約，老將趙充國便採用了此類策略。趙充國釋放在漢朝的開羌酋豪雕庫，遣其返歸轉告諸種：「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併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sup>75</sup> 此為以財物利誘眾羌。針對罕、開羌曾通報漢廷先零欲反之狀，且其與先零結盟後並未有實際犯邊之舉，趙充國力排眾議主張應先擊先零羌，認為「先誅先零已，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矣」。<sup>76</sup> 此為誅主釋從之策。該策取得了明顯收效，「後罕竟不煩兵而下」。<sup>77</sup> 趙充國所以能提出這些有效的破羌策略，是因為其對羌人的內部組織及聯盟機制有着全面、深刻的了解。他曾對宣帝說：「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sup>78</sup> 正因各羌落的互不相統更易於掌控，趙充國便要力阻羌落合

<sup>72</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69。

<sup>73</sup> 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頁77-79。

<sup>74</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84-2885。

<sup>75</sup> 班固，《漢書》，卷69，〈趙充國傳〉，頁2977。

<sup>76</sup> 班固，《漢書》，卷69，〈趙充國傳〉，頁2982-2983。

<sup>77</sup> 班固，《漢書》，卷69，〈趙充國傳〉，頁2983。

<sup>78</sup> 班固，《漢書》，卷69，〈趙充國傳〉，頁2972。

一的局面出現。也正因羌人原本各自有豪、其勢不一，在結成聯盟後，各羌落均是獨立為戰，並未建立統一的領導機構，此為充國着意於瓦解羌人聯盟的措施得以發揮功效提供了很大可能。另外，除這些從內部份解羌人聯盟的措施外，漢軍強大的軍事震懾力更可直接從外部破壞聯盟的維繫。如同樣是應對上述先零羌與諸羌之結盟，宣帝起初希望通過派遣三路漢軍馳援趙充國，「東方北方兵並來」以震懾眾羌，「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sup>⑦</sup>事實上，羌落因懼於漢軍兵威而脫離聯盟的事例在漢代絕不鮮見。以上三種分化羌落聯盟的策略在兩漢對羌戰爭中均屢次為漢廷所使用。

另一類是遷徙「叛羌」入漢郡以防範其與塞外種落結盟並舉。如東漢光武帝之前，西羌諸種中尤以先零羌最為強盛，其多次發起或參與各羌落為抗漢而結成的聯盟並佔據主導地位（見附表）。建武十年（34），「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sup>⑧</sup>這一「復」字，說明諸羌結盟攻掠漢郡並非第一次。<sup>⑨</sup>此次進攻為中郎將來歙擊退。次年夏天，「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sup>⑩</sup>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安帝永初元年〔107〕之前），史書再無先零羌與其他河湟羌種結盟犯塞的記載。應該說，馬援徙羌之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sup>⑪</sup>將勢力較強且反叛無常的先零羌遷入塞內置於郡縣管理體制之下，切斷其與塞外諸羌的聯繫，這樣既易於漢朝控制，又可一定程度上防止諸羌聯盟的形成。自馬援後，羌人內移入塞在東漢成為一種常態。這其中又以西羌豪酋率眾犯塞（包括各羌落聯合犯塞）為漢軍所俘或降附漢朝而被遷入郡縣的情況為最

<sup>⑦</sup> 班固，《漢書》，卷69，〈趙充國傳〉，頁2980。

<sup>⑧</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78。

<sup>⑨</sup> 〈後漢書·來歙傳〉記為：「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范曄，《後漢書》，卷15，〈來歙傳〉，頁588。

<sup>⑩</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78-2879。

<sup>⑪</sup> 長久以來，人們對於馬援內徙羌人之策批判甚多。論者多以羌人入居漢郡後因受漢人欺凌而反叛不斷詬病之。現代學者對東漢徙羌之策也多持否定態度，認為眾羌內徙造成漢朝對羌人更為直接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從而促成了「羌禍」的產生。近年來，王偉對東漢治羌政策進行了重新檢討，認為東漢強迫羌人內徙，對其實行郡縣統治，具有合理性與可行性，是當時別無選擇的選擇。參閱王偉，〈東漢治羌政策之檢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頁31-36。其論具有一定的說服力。馬援內徙先零羌就其政策本身並無不妥，後世因政治喪亂、官治腐敗等原因造成的「羌亂」不應完全歸罪於伏波將軍。

多。<sup>④</sup>眾多羌人乃至某些羌落大部被遷入塞內，不僅削弱了塞外羌人的勢力，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阻止相關羌落再次結盟的作用。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眾羌被徙入塞後便不再聚合結盟了。通檢漢代史籍，塞內羌人響應塞外諸羌叛亂或衝破邊塞與其結合而犯塞的例子絕不少見。但此時用以凝聚塞內外羌人的因素——「同族（種）」情感的發揮因政治邊界（不同的政治歸屬）的存在而變得異常複雜。一些塞內羌人需要根據自身的利益訴求在族群認同與政治認同中進行抉擇，從而決定是否與塞外羌聚合。此類羌人主要分為兩種：屬國羌與保塞羌。關於他們的族群認同情況，筆者曾有專文涉及，<sup>⑤</sup>此處不論。另外，除與塞外羌聚集外，塞內各羌種彼此之間也會相互集結。如附表所見徙居塞內的先零與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等羌種的結盟即屬此類。

以上我們分析的多是漢代西羌的情況，對於居住在安定、北地、上郡等地區的東羌，在其內外亦有着影響分散與聚合的因素存在。根據陳琳國的研究，東羌多數在春秋戰國時期便已居住在上述地區。此外，還有一部份由內徙西羌轉化而來，如移居北地、安定等地的先零羌等。一方面，東羌「同西羌一樣，也是以種落的形態存在。因為沒有出現強有力的羌豪，各種落之間不相統一。在匈奴統治蒙古草原時，他們從屬於匈奴；在匈奴衰落後，東漢朝廷徵發他們為騎兵參與作戰」。<sup>⑥</sup>同西羌相比，東羌各種落在秦漢以來一直依附於其他勢力，自主性不強，未能出現像西羌先零、燒當種那樣勢力強大的羌落。另外，受周遭環境及歷史源流影響，東羌也未形成類似於西羌的種姓家支制度。在缺少主導型力量與凝聚紐帶的情況下，安帝永初二年（108）之前，史籍鮮見東羌諸種聚合抗漢的記載。

另一方面，馬援徙置先零降羌於塞內後，「先零別種滇零當即由天水、隴西進入北地，發動東羌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反叛，並於永初二年在北地稱天子，建立第一個羌人政權，而同時，先零種也加入了東羌的行列」。<sup>⑦</sup>因先零羌的轉化，東羌內部產生了實力較強的種落。在此後幾次的東羌聯盟中，先零羌均位列其中並發揮着重要作用（見附表）。此外，安帝之後，朝政頽敗，漢廷對塞內羌人的控制越來越弱。加上漢朝統治者的殘酷剝削與西羌種

<sup>④</sup>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89-92。

<sup>⑤</sup> 朱聖明，〈兩漢「保塞蠻夷」考論〉，《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頁92-94。

<sup>⑥</sup> 陳琳國，〈東羌與西羌辨析〉，頁35。

<sup>⑦</sup> 陳琳國，〈東羌與西羌辨析〉，頁35。

落抗漢鬥爭的衝擊，使得東羌諸種的反抗與聚合日益頻繁。同時，因居地毗鄰南匈奴與鮮卑，此二者的政治招誘亦能促成東羌的凝聚：「永壽元年，（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sup>⑧8</sup> 延熹九年（166）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sup>⑧9</sup>

對於東羌自身或與其他外族（包括西羌）的集聚或結盟，東漢除短時採用「柔性」措施（如張奐的招誘、隔絕之策）分化外，更多的時候則是以武力鎮壓為主。在永初二年（108）開始的持續十餘年的東羌大叛亂中，面對東羌種落結成的羌人政權，招撫與誘降收效甚微，漢朝官員只能多次採用「刺殺」方略。而直到杜季貢、零昌、狼莫等東羌政權首領相繼被殺，才出現「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儆」的局面。<sup>⑨0</sup> 以往漢廷從內部瓦解羌人聯盟的策略在東羌這裡較難奏效。此從側面表明，相比於西漢西羌，東羌種落聯盟（政權）的穩固性要更強些。<sup>⑨1</sup>

上述可知，在漢代羌人種落之外，影響其聚合與離散的因素均同時存在着，且某些因素還具有雙重性。如西羌的種姓家支制度既可引致羌人種落的分散化，又可促成帶有血親色彩的羌落聯盟；在羌人種落之外，漢朝作為重要的外在力量而存在。羌人既可因「外力」（漢朝的壓迫）而聚合，又往往由於「外力」（漢朝誘降遷徙、武力震懾等措施）的作用而脫離聯盟。此外，還有兩點必須指出：其一，同一因素對羌人種落的影響並非絕然相同。如種姓家支制度下，親緣關係較近的羌落相比其他種落更易聚合在一起。漢朝軍事壓力之下，勢力較弱的羌種總是首先脫離聯盟。其二，各因素本身也是發展變化着的。以外在壓迫為例，東漢西羌種落因大量內移，其受漢朝壓迫的力度及持久度就遠超過西漢時期。另外，有些因素要在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才會凸現並發揮作用。如導致東羌聚合的核心力量（先零羌進入北地）

<sup>⑧8</sup> 范曄，《後漢書》，卷65，〈張奐傳〉，頁2138。

<sup>⑧9</sup> 范曄，《後漢書》，卷65，〈張奐傳〉，頁2139。

<sup>⑨0</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91。

<sup>⑨1</sup> 李健勝等從地理沿革、經濟生活方式、族名命名規律上提出義渠為東羌的一部份。參閱李健勝、武剛等，《早期羌史研究》，頁103-108。若此說成立，義渠的「國家」形態或許對於後世漢代東羌的聯盟及政權的建構起到過一定作用。但是，即便如此，引致漢代東羌凝聚的主要動因還在於東漢時才出現的外在因素。

及其他凝聚因素等。

這樣，對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不同羌落來說，漢羌矛盾激化後，其由上述各種因素造就的外部社會政治環境各不相同。<sup>⑫</sup> 每個羌落需要根據不同的外在環境進行自己的政治抉擇：遷徙避難或結盟抗爭；何時加入或離開聯盟；是否臨時或長久結盟，等等。在漢代羌人那裡，社會政治組織的形成或解散都與其外在環境息息相關。也正是因為外在環境的影響，使得羌人得以突破其分散化的生計模式和社會結構，結成更高層次的社會政治組織。

#### 四、三種社會政治組織的產生、存在、發展與羌人族群認同的特點

西漢初年以前，河湟羌人在親緣關係下各自結成不同部落以適應遊牧生活、保衛或掠奪生存資源與空間，「部落」成為其最為重要且恆定的社會組織。正因如此，在初次遭受中原勢力威脅時，河湟羌人更多的是選擇以部落形態遷徙避難（如印率種人南徙，西羌由湟中遷往西海、鹽池附近），而非超越「結構」邊界組成部落聯盟以抗拒之。伴隨漢人勢力漸入湟中及漢羌互動的逐步深入，羌人部落間的結盟才開始零星出現（見附表）。

進入東漢後，由於西羌的大舉內遷，漢羌互動的深度及廣度均遠甚於前，能夠引致漢羌之間矛盾爆發的契機也愈來愈多。<sup>⑬</sup> 在漢廷的暴政和地方官吏的壓迫剝削下，羌人的族群認同意識極易被激發。在這種情況下，羌人各部落結盟的次數越來越多，頻率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時間也越來越長。（見附表）不僅如此，漢安帝永初二年（108），在與漢軍作戰的過程中，先零別種湊零還在北地郡建立了羌人國家政權。自此，漢代羌人的三種主要聚合形式（羌落、羌聯盟、羌政權）均已出現。

這其中，突破部落形式的羌人聚合（部落聯盟、國家政權）的產生與漢羌往來的深入是密切相關的。漢羌互動不僅改變了羌人原有的族群認同體系，也促成了新的、更高層次的社會政治組織的產生。王明珂曾舉例指出：漢代初年，一個河湟地區土著（羌人）的族群認同體系可能是：牧團→次部落→部落。在與漢人密切交往後，其族群體系成為：牧團→次部落→部落→

<sup>⑫</sup> 對於單個羌落而言，其與其他羌落的關係及與他族（漢人、匈奴、鮮卑等）的關係都屬於一種外在環境。

<sup>⑬</sup> 〈後漢書·西羌傳〉載班彪之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78。

羌。<sup>⑭</sup>而很顯然的，漢羌互動造就的「羌人」認同需要高於「部落」形式的社會政治組織來承載與體現，<sup>⑮</sup>這便導致了更高層次的部落聯盟及國家政權的出現。於是，我們又可將王先生「部落→羌」的族群認同體系具體化為「部落→部落聯盟」、「部落→國家政權」兩種模式。對於漢代羌人來說，其族群認同體系與社會結構是二位一體的。

關於漢代羌人聚合的不同形式及特點，現代學者多有論及。如王俊傑很早便指出：「漢代的諸羌，部落繁多種系複雜，再加以分佈零散，受制於各郡縣，因之他們不可能組成一個包括較多部落的聯盟。……漢代諸羌多次出現的聯盟只是一種局部、單純軍事性的、低級階段的部落聯盟，是出於一時緊急需要的聯合，很不穩定，極易分裂。」<sup>⑯</sup>王明珂也認為羌人「部落間的結盟，只在非常必要時才會出現，通常是為了戰爭」。<sup>⑰</sup>兩人均認為羌人結盟的特點在整個漢代都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變化。黃烈則指出，在安帝永初年間的東羌大起義之前，「（羌人的）結合只是停留在諸種之間『解仇交質』的原始結盟狀態。這種結盟沒有固定的政治內容和組織形式，因此是鬆散的，不穩固的，但到了東羌的起義，情況就不同了」。<sup>⑱</sup>黃先生的眼光尤為獨到。西漢時期，各羌落在結盟後均是各自為戰，並沒有形成統一的領導機構。宣帝時期先零與罕、開等羌種的聯盟便是如此。趙充國在給宣帝的上書中提到：「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sup>⑲</sup>同為聯盟羌落，先零與罕羌的軍事行為卻並不一致。這也為趙充國將他們各個擊破提供了可能。然而，進入東漢之後，特別是自東羌政權建立起，羌人聚合的確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

第一，羌人聯盟向固定化、經常化、規模化與長久化發展。東羌種落中，先零羌從轉化為東羌之初便有招集居於上郡的羌種。東羌政權瓦解後，安定、北地等郡的先零羌同上郡沈氏羌更是經常性地聚合聯盟。西羌種落中，燒當、燒何、當煎、當闐等羌種的固定結盟則自和帝初年以降一直延續

<sup>⑭</sup>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51。

<sup>⑮</sup> 本文所謂「羌人」認同並不是說漢代羌人形成了關於自身同屬羌人的身份意識（實際上「羌人」只是他稱），而是用來指稱不同部落的羌人認識到自己是一類人，有着共同的利益，並願意為了獲取及維護利益而利用彼此間的各種關聯，主動聚合成更大規模的共同體。謹此說明。

<sup>⑯</sup> 王俊傑，〈論商周的羌與秦漢魏晉南北朝的羌〉，頁88。

<sup>⑰</sup>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71。

<sup>⑱</sup>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98。

<sup>⑲</sup> 班固，《漢書》，卷69，〈趙充國傳〉，頁2981。

着；此外，從筆者所製附表可知，東漢羌落結盟的頻率要遠高於西漢；再者，「到東漢時，羌人各部落聯盟的規模越來越大，聯合的時間也越來越長，互相殘殺的情況逐漸減少」。<sup>100</sup> 這其中，尤以東羌政權下的諸羌聯合最為長久，歷時長達十餘年。

第二，東西羌聯盟（聚合）的出現。東羌政權在其建立之初曾招集武都、參狼等西羌種落，此為史載最早的東西羌聯盟；永和六年（141），由西羌且凍、傅難等種發動的叛亂造成「東西羌遂大合」；<sup>101</sup>「（延熹）四年冬，上郡沈氐、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並涼二州」。<sup>102</sup> 另據〈後漢書·西羌傳〉記載，零吾羌與先零羌也參與了此次共同寇掠。<sup>103</sup> 這其中，先零羌、沈氏羌為東羌，隴西牢姐屬西羌，烏吾疑為西羌，零吾羌疑屬東羌。<sup>104</sup> 顯然，這也是東西羌聯合作戰的事例。如果說西羌燒當、燒何等種得以結盟除維護共同利益外，親緣關係依舊發揮着重要作用，那麼，跨地域、跨血緣的東西羌聯盟的出現則意味着羌人的族群認同上升到了新的高度。這一點也為常倩所指出，她認為：「羌人部落聯盟由最初有血緣關係的近親和近鄰部落之間的聯盟到後來不同部落之間的聯盟，逐漸地突破血緣關係，說明其自身族群認同在不斷加深。」<sup>105</sup>

第三，外部勢力的滲入。西漢時期，漢羌之間的互動比較單純，尙未有過多牽涉或摻雜其他政治勢力。<sup>106</sup> 東漢以降，這種情況發生了較大變化。安帝永初五年（111）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sup>107</sup> 其後，杜季貢更是直接參與到東羌政權中，被任命為將軍；中平元年（184），北地先零羌與湟中羌、義從胡共同起兵，「劫致金城人邊章、韓

<sup>100</sup> 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頁79。

<sup>101</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96。

<sup>102</sup> 范曄，《後漢書》，卷65，〈段熲傳〉，頁2147。

<sup>103</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97。

<sup>104</sup> 陳琳國根據烏吾種活動範圍將其歸入西羌之列。參閱陳琳國，〈東羌與西羌辨析〉，頁37。關於零吾羌的身份，史無明言，現代學者也少有論及。據先零別種湊零之子名「零昌」、羌落內部存在的父子連名制度及零吾種與先零羌同時活動等信息綜合判斷，零吾種似為湊零他子分支獨立後的羌種。

<sup>105</sup> 常倩，〈論兩漢時期羌人的凝聚〉，頁79。

<sup>106</sup> 宣帝之前，西羌與匈奴多次遣使互通，某些羌豪還曾向匈奴借兵（班固，《漢書》，卷69，〈趙充國傳〉，頁2973）。然在西漢「隔絕羌胡」的政策影想之下，匈奴對羌落的聚合並未產生多少實質影響。

<sup>107</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88。

遂，使專任軍政」。<sup>108</sup> 諫議大夫劉陶在給靈帝的奏疏中說：「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sup>109</sup> 王勸注意到了第二次羌漢戰爭中（永初元年到元初五年，107-118）與羌人聯合對抗東漢政府的只是像杜琦、杜季貢、王信這樣沒有多少背景的普通涼州百姓，而到第五次羌漢戰爭（中平元年到建安十九年，184-214）時，則有一大批涼州地方實力派捲入到了「羌亂」中。<sup>110</sup> 這些漢朝官民的湧入使得羌人的聚合更為牢固、持久，規模也愈加壯大。而除漢人外，南匈奴、鮮卑等外部勢力亦能引致各羌種之間的聚合，前已述及。

第四，突破單純軍事性質的部落聯盟或國家政權的產生。黃烈認為：「先零政權已經拋棄了解仇結盟的舊有形式，走上了軍事政治的組織結合。」<sup>111</sup> 此與之前無固定政治內容和組織形式的眾羌結盟形成鮮明對比。高恆天等更指出滇零自稱天子等政治舉措，「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秦漢歷史上最大一次少數民族對漢族的政治挑戰，它在短時間內煥發出了羌人所向披靡的戰鬥力和前所未有的政治凝聚力」。<sup>112</sup> 值得注意的是，滇零自稱「天子」在前，接納杜季貢等漢人在後，即「稱天子」並非漢人為其計策，乃是先零羌的自主行為。在「天子」之外，滇零政權不僅配備了將軍等官員，還製有官方文書及諸將印綬。<sup>113</sup> 滇零政權之後，塞內羌人結成具有固定政治內容的聯盟或政權的事例還有以下幾次：據《東觀漢記》記載，「段熲上書曰：

<sup>108</sup> 范曄，《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頁2320。

<sup>109</sup> 范曄，《後漢書》，卷57，〈劉陶傳〉，頁1850。

<sup>110</sup> 王勸，〈羌漢戰爭與東漢帝國的東西矛盾〉，《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頁10。王勸指出這些涼州地方實力派「逐漸掌握了領導權，最後羌人只是他們對抗中央而加以利用的一支軍事力量，僅處於脅從地位」。筆者認為這一過程的完成大致是在靈帝中平三年（186）。據相關史籍，此前東漢地方官吏進入羌人中擔任首領等職務多為「叛羌」裏脅、劫掠所致，其職位也由羌人所委任。因而，在這一時期牽涉漢人的「叛羌」聯盟中，羌人依然佔據着主導地位。然此常在某些特定研究視角下為學者所忽略。正如馬長壽所說，因中平元年（184）之後的羌人活動罩上了邊章、韓遂的外衣，往往被誤以為只是邊、韓等所為，而看不到羌人本身了。參閱馬長壽，《氐與羌》，頁140-141。至中平三年（186）冬，韓遂殺害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羌人開始淪為涼州地方勢力對抗中央的工具。此後，出現在董卓、馬騰軍中的羌胡均是如此。

<sup>111</sup>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98。

<sup>112</sup> 高恆天、湯劍波，〈秦漢時代之羌族道德生活〉，《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頁96-97。

<sup>113</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88。

『又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及長史、司馬、涉頭、長燕、鳥校、棚水塞尉印五枚，紫綬三十八，艾綬二十八，黃綬二枚，皆簿入也。』」。<sup>111</sup>此可證明東漢桓、靈時期，相關塞內羌人有着較為嚴密的社會政治組織，且這種組織有着顯著的政治訴求；前述中平元年（184）的「羌亂」中，眾羌劫掠「著名西州」的漢人掌控軍政，<sup>112</sup>並能以「托誅宦官為名」進軍三輔，<sup>113</sup>政治手段甚為嫻熟；靈帝末年，「義從胡」宋建在隴西枹罕縣建立的帶有濃鬱羌人色彩的「河首平漢王」政權曾「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sup>114</sup>與漢人政權並無兩樣。

第五，地緣關係及共同利益在塞內羌落結盟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王力等指出：「東漢時期，羌族的內遷以漢安帝永初年間（107-113）為界，永初年間以前，主要表現為塞外羌的內遷。」<sup>115</sup>然史籍所見羌人內徙之例多只是塞外羌種的某一部份，羌種整體內遷則較為少見。加上內徙羌人多被漢朝分置於不同郡縣（如馬援徙置先零羌於天水、隴西、扶風三郡），使得內遷羌人的血緣關係日漸淡薄。在這種情況下，地緣關係及共同利益在羌人聚合中的作用就日漸凸顯出來。如永初二年（108），滇零招集諸郡雜種，打破了羌人內部原有的種族家支界限；<sup>116</sup>東羌先零、沈氐等種彼此之間未見直接親緣關係，卻屢次結盟。他們的集聚顯然是基於同處塞內，反抗漢朝殘暴統治的共同目標；上述東西羌的幾次聯盟也是羌人血緣關係被突破的顯例；在此之外，東漢郡羌、州羌稱謂（如隴西羌、金城羌、北地羌及涼州羌等）的大量出現本身也表明同郡、同州的地緣關係在羌人聚合中的特殊作用。

以上羌人聚合新動向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從縱向時間脈絡來

<sup>111</sup> 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17，頁779。該書此處標點有誤，其作「及長史、司馬、涉頭、長燕、鳥校、棚水塞尉印五枚」，若依此，官職數與官印數不符。

<sup>112</sup> 陳壽，《三國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武帝紀〉，頁45。裴注引《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

<sup>113</sup> 范曄，《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頁2320。

<sup>114</sup> 陳壽，《三國志》，卷1，〈武帝紀〉，頁44。關於宋建所建政權之性質，可參閱朱聖明，《秦漢華夷觀念與民族意識研究》（開封：河南大學未刊碩士學位論文，2009），頁64。據〈武帝紀〉記載，該政權於建安十九年（214）冬10月為夏侯淵所滅（頁44）。往前30年，與中平元年（184）時間相合。且宋建於枹罕建立政權與中平元年羌亂中「枹罕河關群盜反叛」（范曄，《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頁2320）的記載相符，我們有理由相信該政權是借中平元年羌亂之勢而建成的。

<sup>115</sup> 王力、王希隆，〈東漢時期羌族內遷探析〉，頁48。

<sup>116</sup>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98。

看，這是漢代羌人不斷鬥爭的結果。在面對外在壓迫時，各羌落力量需要協調一致，於是就有了鬆散的聯盟，而當這種鬆散的聯盟在漢朝分化政策下一次次遭受解散時，組建穩固聯盟或國家政權的行動便又呼之欲出了。<sup>⑯</sup> 換言之，羌人社會政治組織由鬆散結盟向穩固聯盟乃至國家政權的演進是在與漢朝抗爭中逐步實現的。如先零羌在建立東羌政權之前有着多次與西羌種落聯盟的經歷；燒當、燒何等種在結成較為穩定的聯盟之初也曾依循着羌人原始的「解仇結婚，交質盟詛」的鬆散結盟形式。然而伴隨漢羌互動的深入，上述羌人的鬥爭方式也隨之而變。在這一過程中，相關羌種的族群認同意識亦日漸增強。

從橫向時代背景來看，這些新動向可視為是羌人對現實環境所做出的政治、軍事抉擇。東漢以來，尤其是安帝永初之後，塞外羌人的大量內徙使得其原有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先前的聚族而居、分散獨立轉變為與漢人雜處、接受中原政府的管轄。羌人彼此之間及其與漢人、漢政權之間的接觸形式、程度也遠異於前。加上安帝以降朝政的腐敗、統治階級的盤剝、帝國東西方矛盾的加劇及朝廷對涼州地方勢力的防範，<sup>⑰</sup> 這些都使得塞內羌人所處的族際、政治環境變得甚為複雜，促使其不得不根據變化了的外在環境調整原有的聚散策略或創造新的組織形式。

然而，羌人結成同盟或政權以反抗漢朝壓迫並不是漢羌鬥爭的全部。通覽史籍，單一羌落與漢軍進行軍事對抗、部份羌人在漢軍驅使下鎮壓同族、各羌種互相攻掠的事例在漢代俯仰皆是。甚至在東羌起義之後，這些現象依舊存在。如羌落單獨反抗漢軍的事例有：「永寧元年春，上郡沈氏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陽嘉）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sup>⑱</sup> 等等。羌人在漢軍驅使下殘殺同族的事例有：建光元年（121）秋，當煎種忍良與燒當種麻奴等聯兵寇掠湟中，進攻金城諸縣，「（馬）賢將先零種赴擊之」；陽嘉四年（135），應對鍾羌良封等攻掠隴西、漢陽二郡，「馬賢亦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永和四年（139），馬賢率領湟中義從及

<sup>⑯</sup> 朱聖明，《秦漢華夷觀念與民族意識研究》，頁65。

<sup>⑰</sup> 關於漢羌矛盾背後體現的漢朝統治階層的政治鬥爭，可參閱王勣，〈羌漢戰爭與東漢帝國的東西矛盾〉，頁7-12；〈東漢羌漢戰爭動因新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2期，頁18-19。

<sup>⑱</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92、2893、2894、2897。

羌胡騎兵萬餘人擊殺了反叛的燒當種那離，<sup>⑫</sup> 等等。各種落間的彼此攻殺足以證明涵蓋所有羌人的族群認同並未形成。即便是前述較為穩固的羌聯盟、羌政權也都是局部性質的，其並不能團結所有的羌種。各個羌人群體依然可以自主地根據外部環境決定戰與和或結盟與否。也正因不同的羌人部落各有打算、各行其是，「客觀上東漢與羌人集團難以形成足以涵蓋其整個群體的和平交往機制」。<sup>⑬</sup> 由此，對於不同時期的不同羌人群體，其政治、軍事行為中體現出的族群認同意識需要我們具體地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一般而言，族群認同的強度與族際互動的程度息息相關。因此，在族群自我認同感上，東漢羌人明顯強於西漢羌人；位處漢郡之內的羌人則高於居於塞外的同族；而對於同居塞內或塞外的羌種，又以與漢朝往來頻繁的羌種的族群意識較為顯著。這些可以通過以下現象得到證明：從歷史進程上看，西漢時期的羌落大多數時間都以部落形態散居在河谷間，只有靠近漢塞的少數羌種在遭受漢朝壓迫時才臨時結成鬆散的聯盟。這種聯盟無論是在規模、頻率還是穩固程度上均遠遜於東漢羌人，更別談向政權層面發展了。從地域與接觸度上看，那些遠離漢塞（發羌、唐旄等）或與漢朝接觸相對較少（白馬羌、參狼羌除外的蜀、漢塞外各種羌）的羌種，多以部落形態散居，與其他羌種聯繫甚少，他們的族群認同意識是極其微弱的；居於漢塞附近且與漢朝互動頻仍的羌種（西漢為先零等種，東漢則為燒當等種），則能團結他種結盟以對抗漢朝；位於漢塞內的羌人群體（東羌、湟中羌等）在面對漢朝壓迫時更能相互凝聚，甚至突破單純軍事性質的結盟而組建區域政權或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聯盟。而組織形式從部落到部落聯盟再到國家政權，族群認同感顯然在逐漸增強。

再有，同樣是羌落聚合，東漢永初二年（108）之前諸羌的結合多僅為軍事目的，此後其政治訴求則甚為顯著。政治目的及行為的介入使得羌人的族群認同感得到了質的提升；同樣是跨越「結構」邊界的組織形式，塞內外的羌落結盟多限於固定的羌種，而東羌政權建立後，卻能主動招集塞內外同族。從固定羌落的聚合到主動招集其他種落，羌人的同族意識明顯在提高；同樣是羌聯盟，塞外燒當、燒何等羌落的聯盟帶有明顯的親緣色彩，而塞內羌種的聯盟則更多地建立在地緣及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聚合目的的多種、組織成員的多樣、凝聚紐帶的各異標示着相關羌種在族群認同上處於不同的

<sup>⑫</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92、2894、2895。

<sup>⑬</sup> 王勛，〈東漢羌漢戰爭動因新探〉，頁21。

層次或階段。

以上對族群認同的考察是針對總體羌人而言的，事實上，族際互動對族群認同的影響在單一羌種那裡亦可得到很好的體現。如在前述先零羌由西漢與其他羌種結成鬆散聯盟向東漢建構羌族政權、燒當等羌由原始的鬆散結盟向穩固聯盟發展的過程中，族際互動所起的作用是無法抹殺的。正是由於漢羌互動的逐步深入，相關羌種的族群意識日益增強，這才引致了政治行為及其承載組織的升級或鞏固。

很明顯，羌人社會政治組織的形態與其族群認同的狀況有着莫大關聯。正因族群認同感的產生與增強，才有羌人突破各種「結構」邊界組成聯盟或政權等情況的發生。反過來，各種政治組織一經產生也具有凝聚羌人、促成認同的功能。如經常參與聯盟的羌種，其族群認同感會明顯高於他種。以燒當、先零為例，此二者在對面漢朝壓迫時均曾主動招集他種共抗漢軍，「同族」意識甚為強烈。永和三年（138）冬，燒當種那離等率三千餘騎攻打金城塞，為時任護羌校尉的馬賢擊退，「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sup>⑯</sup>永初二年（108），先零別種滇零自稱天子後，更是大肆招集塞內外諸羌。另據附表所見，越是有過聯盟經歷的羌種越易再次集聚。入東漢後，無論塞外或塞內的羌聯盟，其成員多趨於固定。此外，我們還注意到，塞內羌人有意識的政治行為並未伴隨東羌政權的覆滅而消失，相反卻愈加強烈且頻繁。這顯然與東羌政權的建立一定程度上鞏固並提升了塞內羌人的族群認同意識有關。此可在兩個方面得到明顯體現：第一，滇零政權自製印綬文書、任命漢人為官的做法為後世羌人所沿襲。如段熲、劉陶上書中分別提到的塞內羌人；第二，作為東羌政權的建立者，在此後的羌人政治行動中，我們總能看到先零羌的身影。<sup>⑰</sup>這意味着，先零羌的政治訴求並未隨着東羌政權的滅亡而終結。以上種種均可說明，相關羌種的族群認同意識在聚合解散後依然存在。因而，那種以羌人集聚的斷續性來論證其族群認同不穩定性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更何況東漢羌人聯合的時間都較長，最後多是因為漢軍鎮壓而被迫解散，而且也並非所有來自漢朝的壓迫都需要羌人聯合以應對之。

由此，我們可以根據不同羌落在應對外來壓迫或對外掠奪時所能凝聚形

<sup>⑯</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95。

<sup>⑰</sup> 因史籍記載殘缺，我們無法確定段熲上書中所繳印綬歸屬於何種羌人，然從段熲曾花很大氣力剪滅東羌先零來看，這些印綬極有可能為先零羌所有。中平元年（184）的羌亂，先零羌為主要參與者。宋建正是借此次動亂而建立了河首平漢王政權。

成的社會政治組織的形態來判斷相關羌人群體的族群認同程度。這相比於單純以地域及互動程度甄別的方法更為準確和直觀。因為同一地域的羌人在應對漢朝壓迫時的政治抉擇並非全然一致，其所體現出來的族群自我認同的程度也參差不齊。這一點，前有述及，現再舉一例加以申說。順帝永建五年（130），護羌校尉韓皓將原湟中屯田轉置於兩河間，以震懾羌人。「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sup>⑫</sup>可見，處於較低水準的「解仇詛盟」的聚合形式在東漢中後期某些羌落中依舊存在。這些羌種只有在外在壓力迫近時，才放棄彼此間的仇殺，結成同盟。此與同時期同樣位處近塞的燒當、燒何等種在與漢朝對抗時能夠結成較為穩固的聯盟形成鮮明對比。燒當等種的族群意識明顯高於兩河間羌；同樣，單以互動程度確定族群認同感的高低也會有所偏差。譬如，就東羌而言，其早在秦漢之前便已居於塞內，在與漢人的互動上其絕不遜於西漢西羌，然而位處塞外的西羌有過結盟抗漢的具體行動，史書卻未見東羌反抗西漢王朝之記載。直到能夠引致聚合的核心力量及其他凝聚因素的出現，東羌種落的族群認同感才通過羌聯盟、羌政權的建構而爆發出來。

兩漢四百餘年間，羌人中先後出現了部落、部落聯盟、國家政權三種不同的社會政治組織。其中，部落聯盟又呈現出多種形式：以解仇交質為紐帶的較為低級、鬆散的聯盟，如西漢先零等羌、東漢兩河間羌的結盟；主要以親緣關係為紐帶的較為穩固的聯盟，如東漢燒當等羌的結盟；主要以地緣關係及共同利益為紐帶的較為穩固的聯盟，如東漢先零等羌的結盟；以軍事作戰為目的的聯盟，如東漢永初二年（108）之前的諸羌結盟；帶有顯著政治目的的聯盟，如永初二年（108）之後的眾羌結盟。歷時上，從西漢到東漢，羌人各部落聯盟經歷了次數上由少到多、規模上由小到大、穩定性上由弱到強的發展，羌人政權也歷經了從無到有的過程。某些羌落的組織形態在這一歷程中得到逐步提升，如先零、燒當分別主導的鬆散結盟向穩固聯盟甚至國家政權的發展。共時上，同一時期的各羌種因外在環境的差異，聚合形式也有所不同。那些較少與漢人往來和少受漢朝壓迫的羌種，如兩漢時期遠離漢塞的羌落，其恆久以部落形態散居在山谷間。而對於與漢朝互動較多的羌種，在應對外部壓力時則往往會結成更高層次的社會組織。然而，其所能主導或參與的聚合形式並不完全一致。如東漢中後期，羌政權與不同形式的羌聯盟幾乎同時存在着。

<sup>⑫</sup> 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94。

於是，根據上述族群認同與社會政治組織的關係，我們也可以從歷時與共時的角度概述兩漢羌人族群認同的特點：歷時上，從西漢到東漢，羌人的族群認同感總體上在逐漸增強；共時上，不同外在環境影響下的羌種，其族群認同意識有着較大差異。此從不同羌人聚合形式的先後出現與同時並存可以得到較為直觀的體現。因而，無論在共時還是歷時上，羌人的族群認同都具有層次性和多樣性。單純以缺乏凝聚力、並未形成強烈族群認同或凝聚力空前增強、形成了十分強烈的族群認同意識來概述整個漢代或者東漢時期的羌人都是有失偏頗的。

## 五、餘論

以上可知，在漢代羌人中間曾歷時或共時的存在過部落、部落→部落聯盟、部落→國家政權三種不同的族群認同體系。在後兩種體系中，關於「羌人」的認同意識得以產生並維繫。雖然終漢之世這一認同意識並未能涵括到所有的羌人，且凝聚在部落聯盟與政權下的各羌種，在組織解散後也最終重新回歸到部落形態，但是，相比那些恆久以部落形態生存、彼此相互攻掠劫殺的羌落，相關羌種能夠跨越種種「結構」邊界結成聯盟或政權共抗外部壓力，其同族自我認同意識得到大大提升是不言而諭的。

不僅如此，有過參與聯盟或政權經歷的羌種，因社會結構、政治意識、生計模式、文化形象等方面的改變，其彼此或與遠離漢塞的羌落之間的差異逐漸形成。於是，階序化、等級化的羌聯盟或政權與分散化、平等化的部落結構，建構國家政權同漢朝爭衡或介入漢人政事的政治舉動（如東羌政權的建立、中平元年羌亂）與彼此分散獨立、以力稱雄的仇殺行為（如大部份蜀漢塞外羌落、東漢兩河間羌之間的相互抄掠），因聯合作戰而失調的生計模式與因遠離對漢戰爭而保存的傳統經濟生活方式，<sup>128</sup> 因吸納漢人官民及漢朝文化而提升的「華夏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如東漢先零羌及劉陶和段熲上書中所談到羌人的文書、印綬、官職，等等）與不曉文字、無相長一、

<sup>128</sup> 據王明珂的研究，漢代羌人寇邊事件發生的地點和季節在永初元年（107）出現了較大轉變，此前羌人寇邊多發生在河湟地區且集中在秋冬季節，之後則擴展到北地、漢中、三輔、河西地區，四季均有出現。王先生認為這可能表明參與寇邊的羌人部落在內遷邊郡後，其原有生計模式已發生了很大改變或嚴重失調。參見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頁178。而某些羌種聚合在羌聯盟或羌政權之下與漢朝長年累月的持久作戰，其原有的經濟生活方式也必然會受到很大影響。

無它禁令的羌人舊習在漢代，<sup>129</sup> 特別是東漢中後期，先後出現與同時並存於不同羌人群體中。

這樣，伴隨漢羌互動的展開，原本生存狀態幾近一致的羌人分別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由於不同時期外在環境的差異，影響各羌落分散與聚合的因素各不相同，加上涵蓋所有羌人的決策機構尚未形成，多數羌落均能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少數因勢力弱小，常依附或受脅迫於羌人大種的羌落除外），如此，在應對外部壓力時，各羌人群體的政治抉擇就難免會有所出入，社會政治組織的建構及族群認同狀況也因此而參差不齊。

對漢代羌人不同社會政治組織產生過程及族群認同狀況的考察反過來或許能為我們探討商周時期不同「羌人」群體在政治、文明形態上的差異及「羌人」族屬問題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思路或解釋模式。前面筆者提出導致商周不同「羌人」群體各方面差異的主要原因在於外在族際環境的差別，並結合商周至秦漢時期「華夏」西緣人群因外部環境變化而引致社會結構發生變遷的實例進行了分析。但是，由於史載簡略，我們無法確切比較族際互動與族別差異在造就商周不同「羌人」群體上的具體效應。而通過對漢代羌人的考察，我們可知與外在不同族際環境的互動是可能導致具有相同族源的族群最終走上不同發展道路的。如建立羌人政權的先零、主導羌人聯盟的燒當、游離漢塞之外的發羌本同為西羌；同樣是先零羌，西漢時期只是偶爾與其他羌種結成鬆散聯盟對抗漢朝，東漢安帝後，則建立了規模較大的國家政權。諸如此類，在漢代羌人那裡還有很多實例。逆向來看，東漢中後期不同羌種在政治形態、社會結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與商周不同「羌人」群體在這些方面存在顯著差別的情況極為相似。<sup>130</sup> 既然族際互動可以導致具有相同族源的漢代羌人在生存狀態上走向多樣化，那麼將政治、文明形態的不同歸因於族別差異，並以此否認商周各「羌人」群體之間可能存在的族源關係，甚至將「羌」視為西方土著人群的泛稱、概念或想像便稍顯輕率。

綜合來看，從商周到秦漢，隨着中原政權勢力的持續向西擴張，「華夏」西部人群漸次與「華夏」人群發生互動，通過應對不同族際環境的變化

<sup>129</sup> 相關羌落在仿照漢制的基礎上亦有自己的發揮，創製了一些不見於漢政權的印綬、官職。參見朱聖明，《秦漢華夷觀念與民族意識研究》，頁63。

<sup>130</sup> 不同的是，在漢帝國更為強大的軍事鎮壓下，漢代羌政權、羌聯盟所持續的時間要短於商周「羌人」政權及部落聯盟。

而走上了各自相異的發展道路。<sup>⑯</sup> 這種現象與模式一直在「華夏」西緣不斷上演着。

( 責任編輯：唐金英 )

---

<sup>⑯</sup> 商周時期，與中原互動的西部邊緣人群主要分佈在關中、隴東地區，其政權或部落聯盟也多位於該地區。此時，河湟地區的土著人群很少與商周王朝往來，以部落形態散居；秦漢時期，漢人勢力進入河湟一帶，部份羌人開始通過與漢人的互動走上結成聯盟、建構政權的道路，另有部份羌人則徙往更西方，仍以部落形態散居。

附表：兩漢時期各羌落結盟抗漢概況表

時間	結盟羌落	結盟各羌落 主要活動與 進攻的漢郡	具體記載	文獻出處
元鼎五年 <sup>⑫</sup> (前111)	先零、封 養、牢姐種	隴西郡	(元鼎五年)西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 <sup>⑬</sup> 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	〈漢書·武帝紀〉、〈後漢書·西羌傳〉
約太始四年 (前93)	西羌	隴西郡	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 <sup>⑭</sup>	〈漢書·趙充國傳〉
元康三年 (前63)	先零、罕、 開及諸羌種 豪二百餘人	金城郡	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	〈漢書·趙充國傳〉、〈後漢書·西羌傳〉
永光二年 (前42)	彥姐等七種 羌	隴西郡	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彥姐旁種反；彥姐等七種羌寇隴西，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	〈漢書·馮奉世傳〉、〈後漢書·西羌傳〉
建武十年 (34)	五谿、先零 等諸種	金城郡、隴 西郡	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建武)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	〈後漢書·來歙傳〉、〈後漢書·西羌傳〉
建初元年 (76)	卑湏、勒 姐、吾良種	隴西郡、金 城郡	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湏種羌婦，更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為寇。	〈後漢書·西羌傳〉

<sup>⑫</sup> 當時西漢尚在沿用颛頃律，以冬10月為歲首，〈漢書·武帝紀〉將羌人結盟之事係於次年九月之後，於颛頃曆為元鼎五年，在現行公曆則是公元前111年。

<sup>⑬</sup> 此「故安」當為「安故」，為隴西郡屬縣。〈漢書·地理志〉涿郡內有故安縣，但其離羌人居地甚遠，疑誤。

<sup>⑭</sup> 此為趙充國在元康三年(前63)向宣帝上書中的內容，往前三十餘歲，約為太始四年(前93)之前幾年，此次羌落結盟為〈後漢書·西羌傳〉所不載。

(續表)

時間	結盟羌落	主要活動與進攻的漢郡	具體記載	文獻出處
建初二年 ( 77 )	燒當、封養種	金城郡、漢陽郡、隴西郡	( 建初二年 ) 燒當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討之，敗績，羌遂寇漢陽；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	〈 後漢書 · 章帝紀 〉、〈 後漢書 · 西羌傳 〉
章和二年 ( 88 )	燒當、燒何、當煎、當闐、武威等羌種	隴西郡	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眾四萬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闐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	〈 後漢書 · 鄧訓傳 〉、〈 後漢書 · 西羌傳 〉
永元四年 ( 92 )	燒當及其他諸種	金城郡、隴西郡	( 永元四年 ) 燒當羌寇金城；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	〈 後漢書 · 和帝紀 〉、〈 後漢書 · 西羌傳 〉
永初元年 ( 107 )	先零別種滇零、鍾羌諸種	漢陽郡、隴西郡、天水郡	( 永初元年 ) 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為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尚討之；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	〈 後漢書 · 安帝紀 〉、〈 後漢書 · 西羌傳 〉
永初二年 ( 108 )	先零別種滇零與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	北地、上郡、西河、武都等郡	( 永初二年 ) 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眾遂大盛。	〈 後漢書 · 西羌傳 〉
元初元年 ( 114 )	燒當、當煎、勒姐等種	金城、武都、漢中等郡	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抄掠武都、漢中。	〈 後漢書 · 西羌傳 〉
建光元年 ( 121 )	燒當、當煎	金城郡	( 建光元年 ) 八月，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於金城，不利；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	〈 後漢書 · 安帝紀 〉、〈 後漢書 · 西羌傳 〉

(續表)

時間	結盟羌落	結盟各羌落 主要活動與 進攻的漢郡	具體記載	文獻出處
永建五年 (130)	兩河間羌	金城郡	(韓皓)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群羌。……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	〈後漢書·西羌傳〉
延熹二年 (159)	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	隴西郡、金城郡	(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	〈後漢書·桓帝紀〉、〈後漢書·段熲傳〉、〈後漢書·西羌傳〉
延熹四年 (161)	零吾、先零、沈氏、牢姐、烏吾諸種	上郡、隴西、漢陽等郡	(延熹四年)零吾羌與先零諸種並叛，寇三輔；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抄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征；(延熹)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	〈後漢書·桓帝紀〉、〈後漢書·皇甫規傳〉、〈後漢書·段熲傳〉、〈後漢書·西羌傳〉
延熹九年 (166)	沈氏、先零諸種	上郡、安定	(延熹九年)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	〈後漢書·張奐傳〉
中平元年 (184)	先零、湟中羌、義從胡	金城、北地、隴西等郡	(中平元年)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與先零羌叛；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群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湟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	〈後漢書·靈帝紀〉、〈後漢書·董卓傳〉、〈後漢書·西羌傳〉

說明：為謹慎起見，本表只統計史書中明確言及結盟的事例。對其他雖未明言，卻疑似結盟的例子（如不同種羌同時攻掠漢塞、漢郡）不作統計。

#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Group Identity of the Qiang during the Han Dynasty

Shengming ZHU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degree of cohesiveness and dispersal among the various Qiang groups in the Han dynasty varied. At that time no single political structure with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over all of the Qiang had emerged. Qiang groups therefore were generally able to make their own political choices about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Han. Three levels of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developed successively and subsequently co-existed: tribal, tribal alliance, and state political authority. The sense of group identity of the Qiang was correspondingly diverse and multi-level. In term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ethnic identity, the situation of the Qiang in the Han period was similar to that during Shang and Zhou. Study of the modes of life of the Qiang in the Han period may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with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 and the question of group identity.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new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explanatory models for the complex ethnic ecology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western reaches of “Hua-Xia” in the Shang to Han period.

**Keywords:** Qiang, ethnic identity, tribal alliance, Han dynasty

---

Shengming ZHU,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Province, P. R. China. E-mail: zhushengming1984@163.com.